

探访四川大学博物馆——

111岁的高校博物馆 一部“百科全书”

■ 本报记者 陈朝和(图片由四川大学博物馆提供)

相机、手铲、绘图工具安静地放置在探沟中,复原出1934年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在位于广汉月亮湾的三星堆首次科学发掘的场景;照片墙上,述说着20世纪80年代四川大学考古队参与三星堆史上最大规模发掘的故事;一旁的多媒体影像,播放着近年来年轻川大学子继续参与三星堆新一轮发掘的生动画面……

走进四川大学博物馆,《发现三星堆》篇章以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展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四川大学之间的近百年渊源,让往来不绝的参观者们寻访。

“馆内,三星堆、汉墓、四川民窑等丰富遗迹,记述着近百年来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和川大学者们的考古调查活动,揭示了四川的若干历史断面。”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汪东升说。

四川大学博物馆始建于1914年,前身是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这所博物馆与百年学府一起生长,已发展成为一座综合性高校博物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如川大校训,目前,四川大学博物馆以“西南天地,云汇大川”的气魄收纳了西南地区的自然与人文精华,涵盖自然、考古、民俗、民族等内容,如一本“百科全书”,记录和讲述着西南这片土地的锦绣多姿。而且,这部“百科全书”为自身拓展了多种“打开方式”。

学术——

高校学子的实践基地

“在20世纪初现代博物馆理念传入中国的时候,大学博物馆的种子便在这里生根发芽。”汪东升介绍,一直以来,四川大学博物馆突出高校博物馆的学术属性,发挥综合博物馆在收藏、保存、研究、教育各环节的育人功能,“自觉地将自身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

“博物馆是师生开展实习、实验的生动课堂。”四川大学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孟杨介绍,博物馆与四川大学生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等教学平台开展合作,学生在馆内学习采集与制作标本已成为历届师生的教学常态。

此外,博物馆保护典藏部、学术展陈部等内设机构常年对校内外学生开放,成为学校历史、文博、考古等专业学生开展教育交流、实习实践的优质基地。博物馆还为学术期刊、会议等提供科研成果展示平台。

传播——

记录学科历史,弘扬学人精神

川大博物馆馆内如今珍藏着8万件特色文物、百万件珍稀动植物标本,讲述着一幕幕学科发展的历史、一段段前辈学人科研考察的故事,传递着严谨治学、敢为人先的科学家精神。

“世界上共有将近1000种杜鹃花,横断山脉就集中了近40%的种类。”每每讲到此处,川大博物馆讲解员章雅婷都会向大家讲述一段



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全貌。



1934年四川广汉月亮湾,三星堆首次科学发掘的资料图片。

背后的故事:“毛茛杜鹃”标本由四川大学教授方文培采集于四川康定,他是在1928年克服了匪乱、戒严、兵变、战争等困难,历时8个月,累计采集植物标本达4000余号,才最终完成。作为中国植物分类学家、四川大学生物系教授,方文培是第一位系统研究中国杜鹃花的学者,他一生都在致力于编写“中国人自己的植物志”。

“高校博物馆展陈和高校学科发展紧密相连。我们要讲清楚学科脉络,生动有趣地讲好科学研究以及科学家们的故事。”章雅婷说。

公益——

开发研学课程,开展文化服务

2023年,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建成,面朝清丽的锦江,毗邻秀雅的望江楼公园。新馆不仅展陈面积得到数倍扩展,展厅面积达到约1万平方米,还在服务功能上增加了综合大厅、江景互动观景长廊、屋顶植物园,以及服务于博物馆与学科教育的研学空间。

国风设计、适用于低龄孩子身高的桌椅、独立于展厅的教学空间……博物馆内还专门设置了3间研学教室,提供给中小学开展交流活动。



四川大学博物馆展示的西南地区民俗藏品。

“目前,我们已与省内30余所幼儿园及小初高学校建立馆校合作,面向全省师生开展文化服务。”四川大学博物馆公共教育与服务部主任梁英梅介绍,博物馆根据馆藏特色设计出“小小考古学家”“小小生物学家”“小小非遗传承人”等公益研学课程。据统计,今年博物馆面向中小学已开展了近200场活动,有2.6万人次的师生参与了博物馆的公益课程。

汪东升表示:“川大博物馆将在服务于国家一流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研究以及世界交流互鉴中积极作为,努力创建高水平的高校博物馆。”

有霜的早晨

■ 徐龙宽

霜降才过几日,天就陡然不一样了。夜里下了场霜,清冽得很。今早要去城西的批发市场进些货,天色还墨黑墨黑的,我便骑上三轮电动车出了门。

路过大运河桥时,我特意放慢了车速。这桥横在古老的大运河上,有些年头了,石栏被岁月磨得光滑。此刻,桥两边的栏杆上,竟开满了霜花。我停下车,凑近看看。那霜不是均匀地铺着,而是沿着栏杆的纹路,一层层地叠起来,有的疏,有的密,在电动车昏黄灯光的映照下,每一处弯曲的连接处、每一颗凸起的石头上,都凝着一小簇晶莹的花。它们不像雪那样蓬松,倒是极细的粉末,静静地披在这冰冷的石器上。我呵出一口气,白蒙蒙的,那霜花遇着暖意,边缘便微微地湿了些,但在来来往往的车灯的照射下仍闪着无数细碎的星光。这大运河边的霜,是温润的,带着水汽的轻柔。

这么多年,对于霜,我很熟悉,只是不同的时间看霜的心境大不同。少时在乡下读书,学校在5里外的村庄。从家里出来,需经过一片农田。田埂上的枯草、路边的瓦砾,都敷着一层糖粉似的白霜。我觉得那味道应该甜丝丝的,便会用手指蘸了霜放进嘴里尝。冰凉一片,果真有点甜。我不怕冷,一路走,一路用脚去蹭那些有霜的草叶,听着那“嘎吱”的响声,觉得有趣极了。最妙的是学校屋顶的瓦上,霜若积得厚些,在日光下,能反射出五彩斑斓的颜色。有时兴起,我会蹲在学校门口的石桥栏杆边用手指画霜花,画小鸭子,画五角星,指尖被冻得发麻,直到听到学校响起上课铃声,才拎着书包一路小跑飞奔进教室。那时的霜,是玩伴,是枯燥上学路上新奇的点缀,也是我的美术课。

大学毕业后,我做了15年的销售员,天南地北地跑。这霜,便成了旅途中的见证者。记得在武昌时,也是这样的季节,清晨要赶早班船去汉口,渡口石桥的台阶上,摆渡船的篷顶上,都凝着一层薄霜,湿漉漉的,映着青灰色的天光与乳白色的长江水,显得格外清冷。一个人背着硕大的双肩包,踩着那滑腻的霜阶上船,心里盘算着今天要见的客户、要谈的价格,一路行色匆匆。到了赤峰,霜就换了副模样。那霜厚得如小雪,落在旷野里的枯草上,落在牧民的屋顶上,白茫茫一片,风里带着寒气,刮在脸上像刀割。塞外的霜美则美矣,却美得让人想家。当初心里装满了闹劲儿,年轻嘛,总觉得只要肯早起、肯赶路,就没有到不了的地方。

进货回来,天际边才渐渐泛起些微红的暖意。桥下的大运河,水波不兴,静静地流淌了千年,见证了多少如我一般的早行人。吹着清冷的河风,不由地想起两句诗来,一是“却更有人忙过我,蹇蹄先印石桥霜”,其实不算算的,当我到达市场时,早已是人声鼎沸、热热闹非凡;另一句,便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人至中年,回味这两首诗的意境,深感绝妙,诗人不说孤寂,不说辛苦,只将这几样东西静静地摆在你眼前,那全部的滋味,便都靠自己去品了。

过了大桥,不远就是我的小店。我知道,等我载着满满的货物回到店里,灶上一定是“粥可温”,妻子在店里忙碌,孩子也该睡眼惺忪地起床了。一家人围坐在一块,吃着热乎乎的早饭,说些闲话,那才是能驱散寒意的温暖。想到这里,我不觉笑了。人这一生,会走过许多有霜的早晨。少年时用它来游戏,青年时因它而感怀漂泊,到了中年,能在这清冷之中,品出一点安稳的甜意来:桥上的霜,美是极美的,但终究是路上的风景;家的温暖,才是心之所向。

粉笔有个别称——“白墨”。作为一名教师,我喜欢粉笔,喜欢这洁白的墨,借纤细的骨骼,在黑硬的平面上,一笔一笔刻下思想的划痕。每写一笔,它都以自身的磨损,绽放出知识的光亮。

我的教师生涯,仿佛一场洁白的逆行。我40岁了,教了16年的英语,在一所中学当班主任。粉笔灰早已渗进我的指纹,成为一种职业的印记。如今的教室都换上了智能光屏,只要指尖轻点,便有活泼的动画与海量的信息奔涌而至。可我依然在三尺讲台的角落里,为一支粉笔保留了一个位置。

我的祖父,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名乡村教师。他手中的粉笔总是被用到只剩指甲盖大小,无法握持,仍舍不得丢弃。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他在村里祠堂改成的教室里,用这截白墨,为乡村的孩子开启通往文明的微光。母亲说,祖父的大拇指和食指永远蒙着一层淡淡的白,擦也擦不掉,仿佛他一生的执拗和生命的留白。

我的母亲继承了祖父的讲台,在镇中学教了30年的数学。她的备课本上,永远用工整的楷体规划着板书的布局。她常

说:“黑板上的字,要一笔一画,横平竖直。就像做人,根基要正。”那些白色的公式与定理,随着她清晰地讲解,如种子般缓慢而坚定地植入学生心田。簌簌飘落的粉笔灰,如同智慧的扬尘,构成了我童年最熟悉的风景。

而我,成了家里第一个几乎不再使用粉笔的教师。智能屏很便利,色彩饱满,切换迅捷。可当我看着屏幕上流光溢彩的课件,总会想起祖父的黑板——他写字很慢,阳光从木窗格斜射进来,粉笔灰在光柱里缓缓飞舞,像一场安静的雪。

有一天课后,几位年轻同事热烈讨论如何将经典课文压缩成“一分钟短视频”。他们眼中闪烁的光芒,属于一个追求效率与传播的时代。我只是静静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摸着一支粉笔。它粗糙的质感,让我感到一种熟悉的安定。

这多像我们这一代教育者的处境:前面是父辈沉甸甸的师道追求,身后是数智时代轻盈的学习方式。我们站在传统的讲台与智能的屏幕之间,既无法完全回到那个仅靠一支粉笔支撑的朴素年代,也不愿彻底滑向一个全然碎片化、娱乐化的未来。这种张力,让我们活成了教育领域的“摆渡人”——必须懂得新潮的技术,以将学生渡向未来;也要守护教育的初心,确保航向不失偏颇。

我的女儿14岁,她是在智能屏前长大的一代。她可以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看视频、写作业、和朋友即时通讯。她曾问我:“妈妈,如果江水倒流是真的,那水里的鱼会不会很困惑?”

我愣了一下,在孩子看来,逆流而上是一种需要解释的异常。我轻轻擦掉指尖的粉笔灰,对她说:“顺流时,鱼学会随遇而安;逆流时,鱼懂得何为坚韧。重要的不是水的方向,而是鱼是否认清自己的方向。”这话,既是对她解释,也是对我自己宣告。

当一些课堂越来越追求“即时反馈”与“量化成果”,我依然固执地带着学生细细品读经典,依然要求他们认真书写汉字,感受笔尖与纸面摩擦的阻力。我明白有些东西不会出现在试卷上,但这些都是一种“无用之用”。就像粉笔,它最终的归宿是化为齑粉,但它曾支撑起宏大的构想、精妙的推导、经典的诗篇。它的价值,在于粉碎过程的本身,在于知识传递的印痕。

夏天,我送走一届学生,他们在毕业纪念册上写道:“谢谢您让我们知道,在这个短视频时代,还有一种叫‘白墨’的力量。”令我感到慰藉的,并非致谢的言辞,而是在学生年轻的心灵里,或许已埋下了一颗种子——一颗对深度思考保有敬意的种子。

放学铃响了,我收拾好教案。窗外斜阳正好,光线为讲台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色。一个学生跑来,递上一张手写的明信片,上面工整地写着:“老师,您课上讲的‘无用之读书,方为大用’,我好像有点懂了。”

我摸着纸上那略显稚嫩的笔迹,想起祖父手指上的白色、母亲工整的备课纸,还有我盒中那支粉笔。原来,一种逆流而上的坚守,即便微小如尘,也终会在某个年轻的心灵里找到回响。所有的言传身教,所有的春风化雨,所能引发的深层回响,从来不在当下喧闹的市场里,而在未来某个寂静的时刻,于一个已然成长的生命中,突然得到理解与共鸣。

飘着粉笔灰的阳光,照进20世纪50年代的乡村祠堂,穿过母亲伏案备课的80年代,在今天的智能教室里,轻轻落在一个教师的心上。